

专 题

中国模式的特殊性

——兼与俄罗斯模式比较

李 新 李中宇

【内 容 提 要】2017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对中国模式和俄罗斯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模式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与中国的国情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最典型的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俄罗斯的民族性格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特点，要么否定一切，要么肯定一切。俄罗斯民族之根在欧洲，融入欧洲是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夙愿，但西化派的学习西方通常表现为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苏共曾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僵化社会主义体制，后又全盘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民主派照抄照搬西方教科书，全面移植资本主义制度。当学习西方受挫或受到西方的威胁时，斯拉夫本土派往往成为俄罗斯发展方向的主导者，国家就会转向落后于欧洲的东方，表现的却是帝国扩张的历史传统造就的沙文主义和救世主思想。中国民族性格所表现的儒家文化“时中”“中正”“和为贵”“致中和”思想使中国的改革者采取稳健的渐进式改革；而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非理性和极端主义因素导致其改革者采取极端的激进式改革。

【关 键 词】中国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8）05-0005-0023

【作者简介】李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李中宇，上海市中国中学。

“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和中国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运。2017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今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40周年。再过2年，中国将迎来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再过3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100周年，苏联共产党却在建党90周年^②之际解散了。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再过30年，中国将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苏联却在建国70周年前夕解体了。同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和中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中国模式的本源与精髓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③

（一）中国模式的本源：善于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

1. 学习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决定了新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社会主义的苏联在资本主义陷入“大萧条”背景下创造了“孤岛繁荣”的奇迹，彰显了社会主义的魅力。在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条件下，毛泽东提出，“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④。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刘少奇表示，“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而“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② 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该党成立。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并形成以列宁为核心的激进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以马尔托夫为核心的温和的少数派（孟什维克）。1912年在布拉格会议上孟什维克被清除出党，布尔什维克事实上变成独立的政党，由于孟什维克继续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工党更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七大上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鉴于1922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宣告成立，1925年12月俄共（布）十四大上更名为“全联盟共产党”（简称“联共（布）”）。在1952年联共（布）十九大上再一次更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1991年8月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同年12月宣告独立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元首签署《别洛韦日协定》，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宣告苏联寿终正寝。

③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④ 同上，第264页。

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①。这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对保障抗美援朝的胜利、粉碎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以及外国反动势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封锁和颠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其弊端也日益显露，阶级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邓小平总结学习苏联的经验时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②。“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③

2. 学习东欧，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邓小平一方面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④，但他并没有否定借鉴外国经验的必要性。他决定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同时强调，“必须开放……要吸收国际的经验”^⑤。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经过认真研究发现了几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高度集权模式、南斯拉夫高度自治模式和匈牙利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匈牙利模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范围；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扩大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到1987年基本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任务，中国人民告别了“短缺时代”，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也导致了严重的官僚腐败和贫富分化，激进的“价格闯关”造成严重通货膨胀，激化了社会不满情绪。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中国放缓了改革步伐，“治理整顿”导致“市场疲软”，经济发展放缓。

3. 学习东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面对国内政治风波和西方制裁以及苏东剧变，中国向何处去？是改旗易帜走资本主义的邪路，还是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更

①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155页。

② 《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③ 《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

⑤ 《要吸收国际的经验》，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

加坚定了中国走有自己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信念：“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他表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①。邓小平的以上论述表明，中国应该大胆向资本主义学习市场经济。

综观英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德法社会市场经济、北欧高福利市场经济，东亚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更受中国青睐。东亚国家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同样具有高度集权的历史传统，战后在美国的“保护”下开始了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市场经济模式，其核心在于市场经济原则与利用经济手段干预经济生活的强力政府的结合。到20世纪80年代，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被赋予“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称谓。根据中国的具体特点，政府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起主导作用。1992年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重大部署：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和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正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97年提前3年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②。然而，东方文化的专制集权与政府主导推进的过度市场化和自由化形成了猛烈碰撞，过度自由的市场遭遇到国家的强力干预，导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受此次危机影响，增长速度经受了剧烈波动，直到2002年才走出危机的阴影。

4. 加入世贸组织倒逼学习欧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01年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我们正在按世界贸

^①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373、375、377页。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易组织规则的要求,对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进行清理和修改。”^①在各领域各部门“与国际接轨”的背景下,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金融、财政和税收等体制模式,根据国际规则对国内的体制进行深刻的变革,走上“接受规则,推进改革”的发展道路。2002年中共十六大要求“按照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贸易和投资的自由、便利程度”^②,适应私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于2004年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加速器,对接国际规则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中国形成了符合WTO规则的经济贸易体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2008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且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然而,此时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引发欧洲债务危机、社会和政治危机以及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一方面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

5. 学习无止境,将改革开放推向全球治理

经过不懈的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吸取精华为我所用,差不多每十年一个台阶,避免了一次次风险,中国经济规模在短短的30年时间便跃升至世界第二。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便是这样,习近平依然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并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③。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趋于结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和不健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重大部署,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① 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参见中国网2001年10月18日,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APEC/68237.htm>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③ 习近平:《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37、30页。

阶段”这一总要求，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和降低成本重点解决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规则对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对外开放，扩大双向投资与贸易，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进相互谅解、包容、信任的务实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8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010年的80%。

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抄照搬。习近平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要坚持学习和运用，但决不能脱离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抄照搬。在这方面，我们党的历史是有过沉痛教训的。对待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要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其中于我们有益的成分，但决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盲目照搬照套。”^②关于改革开放，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学习匈牙利和东欧其他国家的经济改革经验时，吸取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优长，并结合中国的具体特点，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模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国家避免了严重的政治动荡；而东欧的改革紧随苏联亦步亦趋，不敢跨越雷池，长期停滞，最终导致剧变，共产党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在20世纪90年代学习东亚市场经济模式的时候，中国吸取了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精髓，根据中国的具体特点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成功地避免了严重的经济波动；而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长期固守业已形成的僵化模式，在过度的市场化遭遇过度的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翻了船，致使日本连续失去了两个十年。进入21世纪，中国以加入WTO为契机，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经验，与国际规则和国际市场对接，市场更加自由化，但始终没有放任自由，从而避免了严重的经济波动；而美国的金融过度创新和过度自由突破了监管，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并通过开放和自由的金融体系迅速引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6、47页。

② 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载《学习时报》2012年5月28日。

发了欧洲债务危机。

（二）中国模式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只是以共产国际分部形象出现的。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王明等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指令，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第一次表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①。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开始，抛弃俄国革命攻占大城市的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教条主义必须休息”的要求，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②党的七大明确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全新的社会制度？在当时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模式和苏联实践模式的情况下，中国只能向苏联学习，要求领导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学习外国经验曾经告诫“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真正“引以为戒”，在“大跃进”、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中走了一些弯路，致使国民经济几近崩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了阶级斗争，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农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表示，“照抄照搬别国经验，从来得不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并且第一次举起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⑤他在认真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其

① 《反对本本主义》，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② 《论新阶段》，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③ 《论党》，载《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页。

④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6日。

⑤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和发展阶段、战略步骤和政治保证等做出了正确判断,形成了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①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充实、发展和提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②,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③,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总任务、总体布局 and 战略布局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习近平还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④。党的十九大将这一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

二、俄罗斯的摇摆与僵化

列宁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曾要求党的领导干部甚至“每一个厨娘都要学会管理国家”^⑤,为此,“必须为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

①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www.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5/4526287.html>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3页。

③ 同上,第8页。

④ 《中国共产党章程》,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8页。

⑤ Ленин В.И. Удержат ли большеви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власть.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зд. 5-е.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1. Т.34, С.289-339.

第三还是学习”^①。但俄罗斯并不擅长学习，无论是西化派迷信西方价值观还是苏联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均表现为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

（一）俄国的扩张与斯拉夫派的救世主思想和西化派的历史虚无主义

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打败蒙古人，1547年伊凡四世（伊凡雷帝）加冕始称沙皇，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沙皇俄国，开始走上扩张之路。1598年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1630—1640年就已经扩张到了太平洋沿岸楚科奇半岛。17世纪末领土面积从300万平方千米扩张到了1450万平方千米。彼得一世夺得北方出海口，建都彼得堡，定国号为俄罗斯帝国。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将俄国变成了横跨欧、亚、美三大洲的超大帝国，1866年领土面积达到2370万平方千米。20世纪30年代苏联达到鼎盛时期，成为超级大国之一。俄国的扩张史造就了苏联狭隘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征服和扩张成为俄罗斯民族特性。由此形成了俄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斯拉夫主义，肯定俄国自身的历史发展经验，自恃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认为拒绝俄罗斯民族的发展道路是徒劳的和不能容忍的。斯拉夫派拒绝了学习别国经验的可能性。毛泽东在1956年对此进行了批评：“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②

然而，俄罗斯在回归欧洲方面却从来没有什么架子可端。俄国虽然起源于欧洲，但蒙古鞑靼人的长期统治使其远离了欧洲，打上了亚细亚的烙印，与欧洲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这也使得俄国民族性格的另一面即回到欧洲的思想更加强烈。彼得一世欧洲取经，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和技术，并在国内依靠强权推行了全面改革，按照西欧模式创办了工业。德国公主出身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更是把欧洲的启蒙思想引入俄国，在开明专制条件下实行自由化改革。这两次改革使俄国社会分裂为斯拉夫派和西化派。西化派全盘否定俄国的历史遗产，教条地崇尚西方价值、文化和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俄国才有出路。亚历山大一世时期首相斯别兰斯基推行全盘西化的改革，将自由主义、商品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① Ленин В.И. Лучше меньше, да лучше.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зд. 5-е.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0. Т.45, С.391.

^②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载《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6日。

移植到俄国的法律条文中。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尼古拉二世时期财政大臣维特和首相斯托雷平在加速市场关系的发展和与欧洲的接近方面推行了大胆的改革。直到20世纪末,叶利钦和盖达尔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建立起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但是,由于西化派的幼稚和斯拉夫主义的根深蒂固,每一次西化改革都遭到严重失败,付出沉重的代价,却没有学到西方价值的真谛。

(二)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教条化的深刻教训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设想,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统治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发动十月革命,夺取了政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在余粮征集制遇到严重阻力时,列宁根据俄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及时地转向了“新经济政策”,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喘息”机会。而斯大林教条地坚持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暂时退却的思想,1926年以后针对资本主义成分上升的趋势采取了进攻路线,与此同时开始推行追求高速度“超工业化”。为了保证农业资金来源不断地流向工业和对粮食的需求,斯大林在农村发动了全盘集体化运动,彻底消灭富农。为了镇压由此引发的不满,斯大林对革命队伍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清洗”。这三大运动使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末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斯大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片面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如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单一性,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应”以及阶级斗争尖锐化和无产阶级专政等。

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有效地保证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战胜国内反动派的反扑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并取得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胜利。但是,这种体制在战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导致了一系列弊端,压制了民主,束缚了劳动者的积极性。20世纪40年代末,来自苏联基层的改革呼声被压制,南斯拉夫因为反对照搬斯大林模式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恩格斯早在1890年就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的和改革的社会”^①。而斯大林及其后来的继承者对此则选择性地失忆了,没有对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认真的反思,而是将其看作普遍

^① 恩格斯:《致奥托·伯尼克》,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43页。

适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一切导致苏联社会主义逐渐丧失了生机和活力，累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

1956年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的路线和方针后，赫鲁晓夫率先对工业和建筑业进行改组，取消部门管理制度，实行地方管理原则，中央集权变成了地方分权。将大部分中央管辖的国有工业企业下放到地方，而行政命令的方式并没有变化。这样，不仅破坏了生产的技术链，削弱了技术进步，还助长了地方分离主义，阻碍了经济发展。1964年勃列日涅夫针对赫鲁晓夫的改组进行了“改革”，恢复了集中的部门管理原则，重新加强中央集权。不过，由于经济增速下滑而难以背负与西方国家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勃列日涅夫的“新经济体制”引入了经济管理方法，减少了指令性计划指标，并开始强调经济刺激和物质刺激。鉴于斯大林去世和苏共二十大后东欧集中爆发了民主德国“6·17事件”、波兰“波茨南事件”、“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苏共对改革产生了恐惧。60年代后半期西西伯利亚油气田大规模开采缓解了其与西方军备竞赛的资金紧张。苏联在60年代末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市场社会主义”，以“完善发达社会主义”取代了“改革”一词，改革和发展长期处于“停滞”中。苏联严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暴露出更加明显的弊病，经济增长率跌至历史最低点，经济效率日益下降。

1985年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重启久违了的改革。他从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后退到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进而提出“完善社会主义”的目标。最初他将改革的重心放在了经济领域，然而激进的改革受到了企业、部门、地方等既得利益者的顽强抵制。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把改革的重心转向政治领域，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然而他的政治改革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和执政党地位，放弃了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和共产主义目标。毫无限制的公开性直接损害了苏联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威信，使人民群众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对勃列日涅夫僵化的体制和理论观念的批判转向全面批判斯大林运动，再转向全面评价苏联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苏联1929年以来的全部经验都是错误的”，“要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1990年苏共二十八次事实上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彻底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成果”，承认“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放弃了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代之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放弃了党的领

导地位，代之以同其他政党平等竞争与合作。最终导致了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

20世纪90年代，独立后的俄罗斯照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盖达尔政府全盘接受了根据所谓“华盛顿共识”开具的“休克疗法”药方，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达到所谓的“不可逆转点”，义无反顾地奔向资本主义。结果是“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减少了一半”，“我们的祖国四分五裂”，“社会几乎要崩溃”，使“俄罗斯近200—300年来第一次面临沦为世界二流乃至三流国家的危险”^①。普京在总结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改革教训的时候终于认识到“90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表明，把从外国教科书抄来的抽象的模型和方案简单地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壤，用这种方式来革新我们的祖国是不可能成功的，也不可能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机械地照搬别国经验是不会成功的。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必须探索自己的革新道路……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基本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②。

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传统决定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与改革模式

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文化使中国各民族尊崇“中庸之道”，求“和”求“稳”，避免极端。俄罗斯民族刚一诞生就被蒙古鞑靼人统治了200多年，形成了分裂的欧亚民族性格，易变，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时刻燃烧着“革命”的火焰。

（一）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使中国的改革开放“稳”字当先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③。传说尧、舜二帝禅让帝位时的“十六字心传”，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④，可以说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精髓。“人心惟危”即是一生当中“人之病疼各别，或在声色，或在货利，或在名高，一切胜心、妒心、

① Путин В.В.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30.12.1999 г.

② Там ж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第33页。

④ 孔颖达，尚书·大禹谟。《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3页。

慊心、吝心、人我心、是非心，种种受病”^①的“人心”使得人人自危。人的思想变化多端，有善心也有恶心，如何弃恶从善，改邪归正，就要把“人心”变成“道心”，一般人变成“真人”。按照孔子的话说，人的一生必须“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②。“道心惟微”，只有“道”融于“心”，才能体会“道心”之微妙，“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③，看不见，摸不着，又无处不在。这里体现的是“以心观心”，进而达到心性融合，“天人合一”的境界。要达到这一崇高境界，必须时刻修心养性，用心领悟道行，做到“惟精惟一”。道家的“精”“一”就是佛家所说“制心一处，无事不能”，是修身养性的基本功。亦即精益求精，专一其心，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④。一旦获得“天人合一”之道，做事必然遵守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即“允执厥中”，取其中道，谓之中正。“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⑤

儒家的中庸之道，旨在追求人类社会协调、和谐的正常发展。“中”和“庸”结合在一起，便是不变的理论的基本原则与实践当中适度、正确和恰如其分的具体运用之间的辩证统一。中庸之道蕴含着“叩其两端”而取“中”的做事原则和方法，即力求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它体现了因时制宜、与时俱进的“君子而时中”思想，不仅反对“执一不通”的固守教条，也反对“见风使舵”或恣意妄为，追求“从心所欲”而又“不逾矩”的至德境界，进而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统一的“执中达权”思想。中庸之道持“中”，戒“过”和无“不及”，避免两个极端，力求“中”且“正”的“中正”思想以及“因中致和”、“和而不同”的“中和”思想。“子曰：‘礼之用，和为贵。’”^⑥中庸之道推崇“致中和”的理想王国。孔子这样定义“中”与“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① 李颢：《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页。

② 《大学》，载《论语·大学·中庸》，陈晓芬、徐儒宗译注，第250页。

③ 唐品主编：老子原著《春秋》，陈阳、张晓华注译，载《道德经》（全集），第二十一章，惟道是从。天地出版社2017年版，第95页。

④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⑤ 朱熹：《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载《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

⑥ 《论语》，载《论语·大学·中庸》，陈晓芬、徐儒宗译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天下之达道也”。一旦达到“致中和”，便可以“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①。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②孔子对舜帝善用中庸之道于民赞赏有加，“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③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正确地处理好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为了避免激进的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乃至政治动荡，选择了先易后难的渐进的改革方式，为了避免呛水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力在于自强不息，与时俱进，见贤思齐，“其命惟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帕累托改进”。孔子在《大学》的开篇就明确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⑤。“亲民”体现了儒家文化“德治”和“仁政”的思想^⑥。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便是“为人民服务”，改革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共十九大报告要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⑦。在此基础上使国家、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都有所增加，即“帕累托改进”。由于经济改革会涉及大范围的利益再分配和利益结构整合。对指令性的计划方式资源配置制度进行激进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企业和部门或个人利益受损，改革的阻力会增大。通过渐进式改革，将改革的中心环节定位为微观经营机制，改进企业激励机制，提高经济效率，增强企业活力，进而加速新资源的增长，国家、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都增加了，这样的改革就具有了“帕累托改进”性质。渐进式改革使得改革过程中的速度和稳定保持一定的平衡。要使改革得到众多社会集团的支持、政府获得大多数人民的信任，就必须在改革和发展过程谨慎保持速度和稳定的平衡，并反过来以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获取更大的信任和支持，保持

① 《中庸》，载《论语·大学·中庸》，陈晓芬、徐儒宗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89页。

② 同上，第12页。

③ 同上，第296页。

④ 同上，第254页。

⑤ 同上，第249页。

⑥ 对于“亲民”，朱熹引《康诰》曰：“作新民”，使民自新、革新，使民成为全新的人。无论作“亲民”解还是作“新民”解，只有先“亲民”，了解民之所想、民之所为、民之疾苦，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使“民”“新”。

⑦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第17页。

足够大的权力来把握速度和稳定之间的平衡，为改革提供保障。同时，改革是在政府零经验的基础上推进的，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失误和错误，出现这样和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渐进式改革为政府及时纠正不当的改革措施，解决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回旋的余地，而不会对下一步的改革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其次，先局部试验、后全面推广的成功经验。从农村经济改革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种清晰、透明的分配制度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劳动和生产积极性。只用两年的时间就解决了城乡粮食短缺问题。在农村改革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承包制开始走向城市，在工商业试行并推广企业承包制，对企业扩权让利，从而刺激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对外开放方面，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作为经济改革的试验田，发挥示范作用，验证是好的政策即面向全国推广。在此基础上，1984年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特区政策向沿海开放城市延伸。1992年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进一步延伸到5个长江沿岸城市、沿边13个边境市县和11个内陆省会城市。

第三，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推进相结合，外部诱致性和内部强制性相结合。中国的经济改革顺序实际上是先体制外，再体制内。通过解放思想，逐步放开个体经营、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成分，其地位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逐步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这些体制外经济成分的不断成长和壮大，不仅国家的经济规模壮大了，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而且它们的经营性质和范围、运行方式和模式逐渐向体制内的国有企业渗透和倒逼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加快改革，乃至国有经济战略重组。业已形成的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两大成分及其所代表的市场和计划难以实现融合发展，迫使国家采取了“双轨制”改革。

第四，双轨制改革，先易后难。双轨制改革构想形成于1986年的“莫干山会议”，在继续保持国家对国有企业产品实行定价的同时，允许企业按照指导价格出售商品，让个体经营者、私营企业自行决定其产品价格，俗称“价格双轨制”。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双轨制普遍存在于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和部门，如价格双轨制、养老金双轨制、户籍管理双轨制、资源配置双轨制、资源税收双轨制等等。其核心内容是从计划

轨转向市场轨,方法是以放为主,即将计划额度确定下来,全部放开计划外的管制,承认计划外市场行为的合法性,然后逐步减少计划内交易范围,直至确立市场交易的主动性和完全性。

第五,上述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体现了统筹兼顾的全面思维模式。中共十八大以来,从实现“中国梦”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①,从“三期叠加”^②到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③到“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习近平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始终贯穿着协调发展和统筹兼顾的发展理路。

第六,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荀子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④儒家文化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作为一种思维倾向延续成为顾全大局、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只有避免极端,遵从“中和”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否则便会天下大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改革是源头,只有改革才能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发展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才能信任政府,拥护改革。但是,改革必须保持以稳定为界限,一旦改革过于激进,超过了社会负荷,就会引起社会震荡,甚至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二) 俄罗斯欧亚主义的民族性格埋藏着“革命”的基因

俄国著名思想家 H. 别尔嘉耶夫将俄罗斯的历史划分为 5 个时期:基辅罗斯、鞑靼罗斯、莫斯科罗斯、彼得俄罗斯和苏维埃俄罗斯^⑤。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个时期,即苏联后的俄罗斯。还可以换一种定位:西方的俄罗斯—东方的俄罗斯—西化的俄罗斯—东化的俄罗斯—回归西方的俄罗斯—向东转的俄罗斯。公元 10—11 世纪,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东正教,使基辅罗斯成为东欧强国。13 世纪上半叶,蒙古鞑

① 2014 年 12 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② 在 2014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中央做出一个判断,即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

③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④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70 页。

⑤ [俄] H.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3 页。

鞑人灭掉基辅罗斯开始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使俄国远离了欧洲，强化了亚细亚因素的影响。16世纪中期，伊凡雷帝在莫斯科公国基础上建立沙皇俄国，到17世纪30—40年代沙俄就扩张到了太平洋的楚科奇半岛和鄂霍次克海。向东扩张使俄国长期脱离了欧洲，并落后于欧洲至少一百年。1689年彼得一世开始对俄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动强制性改革，学习欧洲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叶卡捷琳娜二世再次启动改革，引进西方思想和人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鼓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宣布经营自由。1917年十月革命打断了维特和斯托雷平的西化改革，建立了与西方势不两立的苏维埃政权。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一次开始西化改革，付出了苏联解体的代价，俄罗斯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和市场化道路。

如果对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历史进行分期的话，也可以划分6个“西化—东化，自由—保守”的周期。1. 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任命M. 斯别兰斯基为部长委员会首长进行全盘西化的改革。1825年尼古拉一世继位后彻底推翻了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退回到了封闭状态。2. 19世纪后半期，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19世纪晚期，亚历山大三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工业化的措施，反对自由主义。3.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尼古拉二世命财政大臣C. 维特和总理大臣Π. 斯托雷平推行大胆的西化改革。这次改革又被1917年十月革命所打断，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4. 1921年列宁转向“新经济政策”，实行粮食税，恢复商品交易，经济趋向自由化。1927年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转向对资本主义的进攻，到30年代末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5.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进行改组，下放中央权力，扩大地方自主权，结果助长了地方分离主义。1964年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经济体制”，一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另一方面恢复部门管理原则，“完善”变成了“停滞”。6.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开始探索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试图对整个社会主义大厦进行改造，“大厦”却轰然倒塌。盖达尔依据西方“休克疗法”药方，加速民主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代价惨重。1998年普里马科夫治理金融危机，结束了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进入21世纪，普京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权威，重新实行垂直管理，对部分行业重新国有化。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普京结束融入欧洲的“大欧洲”计划，向东转，与亚洲国家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

那么，决定俄罗斯政策周期性变化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H. 别尔嘉耶夫解

释说,“俄罗斯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地跨欧、亚两大洲,将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①

在俄国历史上,由于恶劣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俄罗斯民族不得不依靠村社这种集体主义制度维持生存。存在于整个历史的村社制度确立了俄罗斯的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和从上到下的威权主义和垂直管理。300多年的农奴制是上层人对待下层人暴力、跋扈,底层人对上层人恐惧的根源。村社与农奴制的平行发展,形成了俄罗斯的专制制度,命令式的管理方法成为传统。鞑靼人对俄国240年的统治,使俄罗斯民族脱离了欧洲的发展轨道,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文化,集体主义和威权主义得到进一步巩固。从伊凡雷帝开始,俄国走上强国之路,实现了对新领土的大规模扩张,进一步增强了俄罗斯民族对权力和军事力量的崇拜。随着国家地理边界的扩大,各种语言的民族不断增加,反过来又加强了对毫无约束的集中制政权的渴求。所以H. 别尔嘉耶夫精辟地指出,“俄罗斯式的思想体系始终是集权主义的”^②。它倾向于封闭、传统价值和停滞,不能容忍私有制、财富、现代化和进步。由于俄国脱离了世界经济的中心——欧洲,君主制、农奴制和保守主义严重阻碍了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和民主的发展,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市场经济的萌芽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经济发展水平比西欧至少落后一百年。

彼得大帝的改革培养了一大批主张西化的仁人志士。他们与本土斯拉夫派形成对立,力图变革,主张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欧洲看作俄国的未来。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西化派的繁荣达到了顶峰,但西化派的力量仍大大逊于本土斯拉夫派。由于本土派的阻碍,每一次西化改革都进行得非常缓慢,充满矛盾,难以进行到底,均半途而废,直至逆转。所以,斯托雷平和维特坚信,俄国的改革只能是迅速地、“爆炸式”地推行^③。另外一个矛盾之处在于欧洲中心主义已深入到了每个俄罗斯人的灵魂深处,而欧洲人则把俄国看成是“蛮荒之地”或欧洲的亚细亚^④。横跨欧亚两大洲的俄罗斯没有成为欧洲文明和亚洲文明相结合的

① [俄]H.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2页。

② 同上,第262页。

③ Кудров В. М.,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Дело, 2006. С. 21. С. 80.

④ Там же. С. 21.

桥梁,在两大文明的撞击中形成了先天的欧亚特点的思想观念,把俄罗斯变成亚洲的欧洲和欧洲的亚洲。

两派的斗争严重扭曲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互相矛盾的专制主义与自由放任、国家至上与无政府主义、暴力倾向与人道主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共生于俄罗斯人的灵魂深处,使他们判断事物缺乏理性,爱走极端。“俄罗斯人是极端主义者。”^①利哈乔夫更是明确地表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②俄罗斯这样的民族性格决定了俄罗斯人思维和行为的易变性和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是我的朋友就必定是敌人”,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所以,“用理性你不能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尺度你也不能去度量:因为她具有独特的性格,你只能相信俄罗斯”^③。这是俄罗斯人与中国人在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上的最根本性的区别。所以,在中国“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而在俄罗斯则鲜见。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善于与时俱进致中和而非教条。

俄罗斯在否定以往经验和破坏以前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具有极端的坚定性。如果俄罗斯处在有问题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演进的道路和“大动荡”的道路,那么它一定会选择后者。这也就不难理解,苏联社会主义搞了近70年,说放弃便瞬间烟消云散,“休克疗法”一夜之间把俄罗斯推向了资本主义,而且是野蛮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着眼于将改革推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迅速地达到所谓的“不可逆转点”。让追逐个人利益的经济代理人的活动保障其应有的经济绩效。为此,必须同时创造三个条件,即财政稳定、产权重新配置和经济关系自由化,三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说,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必须同时而迅速地推进,否则,不彻底的改革就会出现逆转。俄罗斯经济改革最终确立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但是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民主化变成无政府状态,自由化致使黑社会猖獗,私有化变成瓜分国有资产,一方面寡头势力崛起,另一方面半数的居民陷入贫困状态,国家经济总量损失近一半。

① [俄]Н.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242页。

② [俄]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③ Тютчев Ф.И. Умом Россию не понять...//Ф.И.Тютчев. Лирика: В 2 т./ АН СССР. - М.: Наука, 1966. - Т. 1-2. - (Лит. памятники). Т. 1. - 1966. - С. 210.

依靠将现成的经济形式照搬到俄罗斯土壤的市场化改革政策，与大多数人的利益不相符合，与俄罗斯经济制度现实存在的需求和约束不相吻合。这样可以解释改革失败的必然性。自由化改革忽视了大众的社会问题和极端的家长制传统。这种裂变造成了俄罗斯社会发展中改革及其逆转的交替和社会意识的矛盾发展。未经过深思熟虑的和不彻底的自由化改革及其导致的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分化，命中注定不是在治愈而是在残害俄罗斯社会，改革的逆转则又进一步分裂它。逆转阶段的到来应当看作是社会经济体系对外来元素植入其中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这种保护机制的运转意味着彻底脱离市场改革路线的保守反应的启动（俄罗斯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也可能意味着需要放弃不正确的改革路线，转向经济政治改革的反面。如果这种机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起作用，那就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即社会经济体系进入自我毁灭阶段，伴随着危机、混乱、骚乱、社会和政治动荡。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的一系列事件都是非常直观的证据^①。改革逆转付出巨大代价，垂直管理带来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浪费，这种自我保护尽管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这种成果一般持续时间不会太长。经过一定时期的“停滞”，俄罗斯又将重新准备改革。

四、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总结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改革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就无从谈起。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保持了政治路线的长期稳定，为改革开放规划了明确的方向；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各代领导集体之间顺利的政治交接保障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延续性。相反，俄罗斯西化派将稳定视作“停滞”，稳定时间久了就产生“革命”的渴望，方向和目标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要改变现状，而“革命”则是要付出代价的，发展进程会被打断。

第二，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注重学习和借鉴他国经验。中华民族从来就是注重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从学习中一路走来的。中国学习、

^① Рязанов В. Т.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и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Экономика, 2012. С. 260.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学习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并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扩张主义、救世主思想、帝国情怀使俄罗斯难以放下架子向他国学习,俄罗斯的西化派虽然主张向欧洲学习,但是要么被傲慢的斯拉夫派所阻挠,要么就是不顾俄罗斯国情照抄照搬。

第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不同的国家治理体制及其改革方式。中国、俄罗斯和东亚都具有集权专制的历史传统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都曾占据主导地位。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和东亚国家受儒家文化避免极端的“时中”“中和”“和天下”的中庸之道影响,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俄罗斯非理性独一无二的极端主义的民族性格决定了其改革方式必定是极端的、激进的和“休克式”的、“革命式”的,并伴随巨大的社会震荡。

第四,不同国家的正式制度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基础上固化形成的,借鉴他国经验切忌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制度都是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组成的。照搬来的制度只能是正式制度,而非正式制度是搬不来的。这样搬来的制度是不完全的,且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形成撞击,产生排异现象,不可能成活下来。制度移植也有可能成功,但必须先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在局部进行试验、磨合、适应和培育,等到二者完全相互适应、合为一体之后再进行全面推广,例如中国的经济特区、双轨制、渐进式等“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而像俄罗斯那样试图一步跨过河去,则非常容易失足落水,甚至溺亡。

(责任编辑 靳会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китайской модели развития и ее сравнение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оделью развития

Ли Синь, Ли Чжунъюй

【Аннотация】 В 2017 г. в России отмечалось столети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2018 г. Китай отмечает 40-летие политики реформ и открытости. Подробный анализ и сравн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оделей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модели являло собой процесс непрерыв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в ходе которого Китай “перенял все самое лучшее и отбросил все лишнее”, и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условиями и конкретной практикой Китая, наиболее типичным вариантом стала китаизация марксизма. Особенность рус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 переход из одной крайности в другую, безоговорочное принятие или полное отрицание всего. Корни русской нации находятся в Европе, и хот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в Европу всегда оставалас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чаянием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однако у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а изучение Запада зачастую сводилось к слепому копированию догматизма, КПСС отличал догмат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к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теории, застывшая систем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произошел полный отказ от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демократы просто копировали западные учебники и осуществили полномасштабную “пересадку”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Если изучение Запада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неудачным или возникает угроза со стороны Запада,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концепция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как правил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главенствующей, страна делает поворот в сторону отстающего от Европы Востока, демонстрируя шовинизм и идею мессианизма, порожден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и традициями имперской экспансии. Такие конфуцианские принципы, определяющие кита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как “идти в ногу со временем”,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и честность”, “дорожить миром”,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гармонии”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тому,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реформаторы избрали курс проведения постепенной и осмотрительной реформы; между тем, такие черты рус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как ир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мышления и склонность впадать в крайности стали причиной выбора Россией радикального пути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итайская модель; социализ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 Россия

Features of China Model — Comparison with Russia

Li Xin, Li Zhongyu

Abstract: 2017 i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2018, China celebrated its 40th anniversa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depth discussion and comparison of the Chinese model with the Russian one reveals that the Chinese model is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learning. In this process the CPC took its essence, discarded its dross, on the one hand, and combining concrete practice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most typical practice of China is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Russian n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ing from one extreme to the other, either denying everything or affirming everything. The root of the Russian nation is in Europe, and it is the historical long-cherished wish of the Russian nation to integrate into Europe. However, the learning from West by the Western school is usually manifested in the dogmatic copy. The CPSU treated the Marxist theory in a dogmatic manner and ossified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n abandoned it entirely. Meanwhile, the democratic school copied the Western textbooks and transplanted the capitalist system. When learning the West is frustrated or threatened by the West, the local Slavic school often become the dominant guider in Russia's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the country will turn to the East which lags behind the West, showing the chauvinism and Salvationism which are created by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Empire. The Confucian culture such as "Golden mean", "Clear order", "Harmony" and "free from extremes" in Chinese nationality makes Chinese reformers adopt steady and gradual reforms; while the irrationality and extremist factors in Russian national character have led to radical reforms by their reformers.

Keywords: China's model;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ussia